

爱的纽带: 1834-1951 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日记和书信研究

In the Bonds of Love: The Personal Diaries and Letters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34-1951

苏怡恩

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耶鲁大学

Ian Skoggard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at Yale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探讨了 1834 至 1951 年间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情感境界。他们去中国传教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如何在日记和家信中描述自己对于周围的人、传教地区以及传教工作的感受？这些感受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他们的情感在他们的公开演讲和私人谈话中，在发表的专业论述和未发表的私人信件交流中，是否存在差别？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真实感受如何？有多少现存资料记录了这些感受？或许情感是连接两国人民之间最紧密的纽带，而许多情感并没有得到记录和保存。幸运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在华西方医学档案保存了在华工作的医疗传教士的日记和私人信件，提供了研究两国情感世界的独特机会。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ffective realm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serving in China. What factors shaped their desire to go to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How did they express their sentiments about people, place, and work in their personal diaries and letters home? Did these feelings change over time?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nd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discourses used in their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Above all, to what extent did the Western foreigners empathize with their Chinese subjects and hosts? To what extent was

this empathy reciprocated? Perhaps the strongest bonds that people from any two nations can forge are the ties of sentiment, much of which goes unrecorded and undocumented. However, the personal diaries and letters of medical missionaries working in China in the Yale University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archives offer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is realm of affect between two nations.

引言：情感的重要性

“情感”是隐藏于意识深处、与意识同在或区别于意识的一种重要力量。情感能超越情绪，促使我们去行动……[或能]让我们徒然地感叹世事无常。¹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对感情或情感领域的研究一直很不够。然而，随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该主题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一趋势有望得以扭转。虽然人们很难对情感进行分类和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情感一直被科学所忽视，情感依然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预感和直觉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激情则为行动提供了动力。²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感知的能力是理性决策的必要组成部分。简言之，人类是会思考的生物，同样也是有感情的生物。但人们对感情长期存在一种偏见，更重视认知和理性的思维过程，而忽视了情感。这种偏见在身心二元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自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以来，身心二元论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框架。笛卡尔假设思维是明显区别于情绪和身体、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由于忽视了连接身心之间的感情，学者们禁锢了自己理解人类行为的能力，导致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和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推测，感情先于认知产生，且感情独立于认知而活动。³达马西奥（Damasio）认为感情是头脑对身体内部状态的映射，是一种“身体的思考”。⁴人类学家沃尔特·施密特（Walter Goldschmidt）认为情感是理解人

1 Gregory Seigworth and Melissa Gregg, eds.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Avon, 1995)

3 Robert B. Zajonc, "Feelings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0) 35(2), pp. 151-175

4 Antonio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Orlando, FL: Harcourt, 2003)

类行为和进化中缺失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所称的“情感饥渴”植根于母爱与性爱中。

“人类社会用育儿的情感来塑造并规范社会关系。”⁵ 在家庭熏陶中获得的情感通过仪式向外延伸，形成更广泛的感情。对于施密特而言，仪式是“第二种沟通模式”和一种“情绪的语言”。社会学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把理解感情称为一种先于语言、先于认知的主体间媒介，是一种情感经济体。在她的模型中，感情在社会体中循环，平衡心灵与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能凝聚不同的主体，也能使之相分离。⁶

在哲学上，情感理论根植于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 1632-1677）的作品中。斯宾诺莎并未将头脑与身体一分为二，也没有割裂思考与感觉。根据斯宾诺莎的理论，头脑和身体浑然一体，并无区别，两者存在内在的联系且互相依赖。⁷斯宾诺莎认为，智慧既追求快乐，又渴望善良。在中国哲学中，儒家的美德“仁”包括情感的成分，被翻译为“善行”（benevolence）和“爱”（love）。⁸道教的“道”是指先于语言、先于认知的心灵境界。⁹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德，即实践智慧（*phronesis*），是认知的一种形式，包括直觉与身体的感觉。¹⁰20 世纪卓越的后现代西方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在学位论文中研究了斯宾诺莎，并认为他是哲学家中举世无双的“王子”。德勒兹质疑了推理在研究世界的方法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并摒弃了所有的先验观念。¹¹

但所有这一切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任何有关情感的研究都面临一个挑战：如何以不带自身情感的方式来研究感情。用语言来表达感情对任何作家或演说家而言已然不易，而

5 Walter Goldschmidt, *Bridge to Humanity: How Affect Hunger Trump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 Sara Ahmed, "Affective Economies," *Social Text* (2004) 22:118–39, p118

7 Michael Mack, "Toward an inclusive universalism: Spinoza's ethics of sustainability. In Dimitris Vardoulakis, ed. *Spinoza N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99-134

8 See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by James Legge, Arthur Waley and Burton Watson.

9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0 Bent Flyvbjerg,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Why Social Inquiry Fails and How it Can Succeed Ag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

11 Jon Roffe,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www.iep.utm.edu/deleuze/> accessed 10 July 2013.

对于要求客观、理性、不掺杂任何情感的科学家而言，则更为困难。然而，任何希望发展用于研究和理解情感语言的学者，都必须直面这个挑战。本文就是发展这种语言的一个尝试。文章以情感考古学开篇，引用了 1834 年至 1949 年在中国工作的医疗传教士的书信，来发掘其中的情感内容。通过阅读医疗传教士的私人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从中提取了表达感情、情绪和情感的内容。用这些感性的旧物来构建情感的故事，连接情感的发展线索，并展现情感的起伏变化。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 1834 年至 1951 年间九位在中国服务的医疗传教士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其中有三对是一起工作的夫妻，慕赓扬（Lorenzo）和露丝（Ruth Bennett Morgan），乔治（George）和克拉拉·萨金特·谢泼德（Clara Sargent Shepard），尼尔（Neil）和爱丽丝·熙·刘易斯（Alice Hay Lewis）。除了爱丽丝以外，其他八位都是医生。大部分人服务的时间长达 20 年。由于缺乏资金，爱丽丝在中国服务 7 年之后被迫回国。金荷兰(Helen Kintner)是一名护士，只服务了三年时间。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作为在中国事奉的第一位新教医疗传教士，本可以成为医疗传教士的前驱，为后人开辟道路。受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BCFM）委派来到中国后，伯驾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医疗工作方面，先后在新加坡和广州开设了医院。由于他过于专注于医治病人的身体而非教化心灵，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失望之下于 1845 年开除了伯驾。之后，他继续留在中国，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兼职翻译，不久被美国总统约翰·泰勒（1790-1862）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秘书兼翻译，并于 1855 年返回美国。多年之后，美国公理会差会对伯驾医疗传教工作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变化，于 1871 年选举他为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董事。¹²

本文的材料来自耶鲁大学档案馆三个资料库保存的 1800 年至 1950 年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档案，包括神学院图书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手稿馆和档案馆，以及医学史图书馆。档案的内容包括组织和机构的报告、私人文件、新闻报道、期刊和出版材料。在一个特别

12 Gerald H. Anderson, "The Legacy of Peter Parker,"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013) 37 (3):152-156

的中国记录项目（China Records Project ,CRP）中，有 30 个不同的记录组主要收藏包括伯驾的特别文件集以及慕赓扬和露丝的文件。中国记录项目中还包括杂项篇（即杂项个人文件的收集，MPPC），收集了来自 434 人的材料，其中包括 30 份口述历史材料。该档案的指南可以在网上获得(www.library.yale.edu/div/fa/WMC-Yale.html)。整个伯驾文件集收藏在耶鲁大学库欣/惠特尼医学图书馆，内容均已数字化，可以在网上获得（<http://cushing.med.yale.edu/greenstone/collect/pppapers/>）。收藏的内容包括伯驾的信件、日记、讲道和医院报告。

传教的召唤：慕赓扬和露丝（1905 至 1946 年）

慕赓扬于 1875 年 8 月 15 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加尔瓦（Galva），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五。他毕业于 Galva 高中，在乡村学校任教一年后进入伊利诺州盖尔斯堡的诺克斯学院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露丝于 1877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莫尔顿（Morton），在家里两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她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两人在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时相识。

慕赓扬听从母亲的建议，于 16 岁时加入卫理公会。次年在他参加一个宗教复活仪式的时候，感受到了“内心闪电般的震撼”，使他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信仰。¹³在诺克斯学院，慕赓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其他教派的同学，与他们一起学习科学。后来他在给传教委员会的申请信中写道：“与来自不同教派的同学建立的密切联系，拓宽了我的宗教生活，而科学教育与宗教信仰的融合又显著加强了这种联系。”¹⁴在上大学时，慕赓扬就决定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他写道：

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我对引导他人皈依基督教就颇感兴趣。1898 年当耶鲁传教委员会来到我所在的大学城时，我对传教尤其是在外国传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3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A. W. Halsey, Sec.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Presbyterian Church, NYC, 11 May 1904, Lorenzo and Ruth Bennett Morgan Papers (LRBMP), Record Group 126, Box 24, Folder 353.

14 同上

在尽可能地仔细考虑此事（由于当时我对外国传教士的工作知之甚少）以后，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传教士。我听取了耶鲁大学董事会 A.B.威廉姆斯的建议，我决定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¹⁵

慕赓扬的宗教体验发生在他经历性成熟和性觉醒的阶段。不幸的是，性欲被当时的教会生活所忽略，不仅不被认可，甚至还会遭到痛斥。这对任何一个试图遵从讲坛上的神圣布道，抑制自身欲望的青年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复活会议将年轻人的注意力引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后又复活的基督，来排解荷尔蒙的冲动和欲望。

慕赓扬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学习，在那里遇到了同在医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露丝（1877- 1955）。慕赓扬和露丝都发现医学院试图影响学生的健康。当时露丝的身体很不好，患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被称为“情绪紧张”¹⁶的顽疾。在给露丝母亲的信中，慕赓扬这样写道：

从身体状况来看，露丝和我都已不堪重负……但我们彼此相爱的事实一直存在，尽管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并已谈到我们对于未来的计划。在所有的计划中，我们认定我俩要在一起，但忘记了神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从我俩在一起开始，就从来没有真正主动争取过什么。事实上，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互相追逐对方。我们热切地希望上帝会永远引导我们，并与我们同在，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犯错或者违背他的旨意。因此，我认为是祂出于对我们的考虑而让我们处于不确定之中，并以祂的方式来教导我们。¹⁷

“神的旨意”隐含对神学的理解之中，是一种先于认知、根植于情感领域的概念。这是一种让人联想起传教感召的语言，源自神的旨意，而非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根据达马西奥对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及重要性的认识，在决策时宗教思想更倾向于认知的情感部分。

15 同上

16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Mrs. Mary Bennett, 5 December 1903, LRBMP 126-2-26

17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Mrs. Mary Bennett, 22 February 1904, LRBMP 126-2-26

在慕赓扬决定是否去报名国外传教的过程中，祷告也发挥了作用。在一次祷告后，慕赓扬获得了回应：“在此时此地我就获得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告诉我这是我应该做的。”之后他又继续获得了回应：“我不仅愿意而且是热切地希望去传教，因为这是上帝要我做的，我非常小心地尽可能避免错过祂的任何一点教导。”¹⁸

关于神的宗教理解，带有一种神圣的、先于意识的起源，是当时话语中常见的内容，在露丝家人写给慕赓扬的信中也有所反映。露丝的阿姨在收到上文提到的慕赓扬写给露丝母亲关于露丝的健康以及两人关系的来信后，回信写道：“非常感激你和我们露丝之间的友谊。我们相信，既然天父已经引导你走了这么远，给你一个相爱的伴侣，因为祂不愿让祂的孩子们伤心，你的婚姻也必须符合祂的意愿。在未来祂将一如既往地指引你，指给你看祂为你未来工作准备的地方。”¹⁹

虽然最早传教的呼唤可能来自上帝，慕赓扬的确施加了自己的意志使之成为现实。他改变了教派，以便找到有医疗传教士的职位的传教会，这在当时是个不寻常的举动。循道卫理会和公理会都不需要医生，但“南长老会急缺医生，所以立即将我收入麾下。”²⁰露丝也写信回家，将他们的决定告诉家人：

我在南山长老会的派遣下去国外传教，我想全家应该没有人对此有任何异议。我个人认为教会，至少在巴爾特的南山长老会在许多方面都比任何其他教会做得更好。我觉得他们关于的信仰告白十分详尽，但包含了必要的内容。我想一个门外汉不需要也不应该对一些自己可能不认同的事了解得过于广泛。²¹

传教的呼唤对慕赓扬和露丝这一代的男男女女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也很容易得到教会的支持。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何时进入慕赓扬和露丝视野，成为一个传教的目的地。中国是最大的传教地区，也是许多教会希望布局的地区。虽然慕赓扬的家人对于他去

18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A. W. Halsey, 11 May 1904, LRBMP 126-24-353.

19 Ruth's Aunt, Letter to Loren (Morgan), 10 March 1904, LRBMP 126-2-26

20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Dear Folks at Home," 28 June 1904, LRBMP 126-2-27

21 Ruth Bennett, Letter to Family, 26 June 1904, LRBMP 126-2-18

传教心存疑虑，但他本人十分坚定。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是我学医的目的所在，现在我已整装待发。我将成为一名医生。”²²在给家人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现在请回应一下你们对于此事的感受。我计划于9月出发，大约会呆7年。工作是在中国内地旅行数日。旅途可能很辛苦，但应该不会有危险。那里的气候与伊利诺伊州没有太大差别。我既不会名扬天下，也无法成名成家或腰缠万贯。²³

一旦设定了目标，事情就进展得很快。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教会希望露丝和慕赓扬去田纳西州的观景峰接受一段时间针对海外传教士的训练。教会还强烈建议他们在去中国传教之前结婚，他们于是在田纳西州简单地举办了婚礼，没有时间进行准备，也没有邀请新朋好友。双方的家人对这种不寻常的行为都表示担忧。慕赓扬写信回家安抚家人：

“布兰切斯（Blanches）的来信收悉。你们似乎对我行事的考虑心存担忧，这也不怨你们。然而，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唯一需要做的事已经完成了，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的选择而感到非常高兴。”²⁴

1904年，也就是露丝和慕赓扬从医学院毕业并结婚的那一年，他们乘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几个不同的地方一共服务了42年，其中在江苏省海州的时间最长，从1909年一直到1932年。此外，他们还在江苏清江和安徽芜湖分别呆过一段时间。两人在中国生了四个孩子，老大不幸夭折。当日本人攻占芜湖时，慕赓扬被关进集中营里，在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回到美国。

爱的纽带：克拉拉·萨金特·谢泼德（1908至1938年）

克拉拉·萨金特·谢泼德医生（1889-1975）于1908年至1938年期间中国服务了二十年。她于1889年4月30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该市建立于1849年，位于密西西比

22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Dear Folks at Home,” 28 June 1904, LRBMP 126-2-27

23 同上

24 Lorenzo Morgan, Letter to Father, 5 July 1904, LRBMP 126-2-27

河与明尼苏达河的汇合处。起初是一个堡垒和交易中心，不久成为明尼苏达新界区的首府和进驻明尼苏达州与北达科他州的要道。在克拉拉出生的前十年，圣保罗市的人口增长了三倍，达到 133 156 人。她的父亲是圣保罗苏城（St. Paul-Sioux City）铁路的售票员，这条铁路将新移民输送进来，同时将当地农民生产的粮食运送出去。克拉拉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她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父母都在教堂的唱诗班唱歌。

1965 年，克拉拉为她的孙辈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手稿，讲述她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手稿包括她和丈夫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写给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件。手稿的标题是“爱的纽带”。²⁵在前言中，她引用了她的祖父曾告诉她的话：“只有加入了你们两人以外的利益，你们对彼此的爱才能长久。”²⁶对于一个富有传教士精神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恰当的警句，反映了 19 世纪末期美国的时代特点。手稿的标题来自该传教地区另一位传教士写给丈夫的书信，这位传教士在信末署名处写道“爱的纽带”，以此指代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使命。我保留了这个标题作为本文题目的一部分，来指代在中国努力生活和工作的医疗传教士的情感境界。

在克拉拉就读于三年级时，她的家人搬到佐治亚州的瓦尔多斯塔（Valdosta），一个毗邻佛罗里达州的小镇。瓦尔多斯塔成立于 1860 年，就在这一年，海湾大西洋铁路竣工，瓦尔多斯塔成为这条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克拉拉的父亲继续在铁路工作。他们全家加入了第一浸信会教堂。在世纪之交，瓦尔多斯塔的人口为 5613 人。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克拉拉的大姐患上了伤寒疟疾，高烧不退，很快去世了。作为在南方生活的北方人，克拉拉发现很难融入新社区，因此在教堂寻求庇护。高中毕业后，她在农村学校任教，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职业，决定就读于一个小型女子学院——佐治亚州福塞斯的贝西·蒂夫特学院

25 Clara Sargent Shepard, *Yours in the Bonds of Love*, 1965, 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 (MPPC), Record Group 8, Box 316, Folder 1.

26 同上, 128

(Bessie Tift College), 位于佐治亚州梅肯市以南 33 公里。²⁷正是在这所学院, 她“去外国传教的计划开始成形”。²⁸

克拉拉立志要一生传教, 但不得不等到 25 岁——这是单身女性传教的最低法定年龄。她认为传教的最佳方式是到医学院学习, 成为一名医生, 于是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学医, 虽然当时她并不清楚自己将去哪里服务。然而, 医学院里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可能成为促使她选择去中国的一个诱因。这一事件也显露了她性格中的独立性, 在很大程度上使她选择了男生占主导、少有女生就读的医学院。由于克拉拉饱受南方同学的排斥, 对于与自己处境相似的人, 她自然充满同情。在密歇根州医学联谊会上, 克拉拉结识了一个孤独的中国学生, 两年之后又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学生。第二个中国学生的到来, 惊动了联谊会的其他姐妹, 视之为“外敌入侵”。克拉拉对联谊会姐妹们的狭隘感到震惊, 带着她的两个中国同学离开了宿舍, 住到校外。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 克拉拉先后在波士顿新英格兰妇幼医院妇产科和伍斯特纪念医院外科实习。她开始实习不久, 父亲不幸去世。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 在那里她被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健康教育的梅休小姐招募, 作为基督教全国健康教育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去中国工作。在 1919 年夏末, 她从旧金山乘坐 S.S. 南京号启程赴上海, 并于三个星期后抵达中国。

在上海, 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向她介绍中国食品, 教她如何使用筷子。不久之后, 她搬到南京, 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中文。克拉拉喜爱时装, 买了价格实惠的亚麻布、丝绸和格纹棉布, 又从美国订购了时尚杂志, 请中国裁缝按照杂志上的式样订做各种时髦服装。在夏季, 整个外国传教团都去江西省牯岭(庐山)避暑。在牯岭, 克拉拉为年轻的中

27 Bessie Tift College was a Baptist college founded in 1849 as the Forsyth Female Collegiate Institute. It pioneered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was renamed Bessie Tift College in 1907 in honor of a devoted alumna, Elizabeth Willingham Tift, who married Henry Tift (1841-1922), a local businessman, developer, civic leader and benefactor, originally from Mystic, Connecticut. In 1956 the college was renamed Tift College. It merged with Mercer College in 1986 and the original campus in Forsyth closed a year later.

28 Shepard, *Bonds of Love*, 2-3

国女孩设立了基督教女青年会营地。她还找到了栋小楼给女孩子们作宿舍，并带着她们一起去远足野餐。

夏天过后，克拉拉被送到北京继续语言学习。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新西兰籍的乔治·谢泼德。他们一起游览北京，为充满魅力的中国艺术和建筑所倾倒。她这样写道：“在宫殿、博物馆和寺庙里，我们凝视着无价的艺术珍品。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透过这些艺术品，我们感觉到一种精致与成熟的精神。乔治说，他会尽其所能地保护这份珍贵的遗产。”^{29 30}

又有一次，在国际学生聚餐之后他们沿着城墙漫步：

北京特色的大餐确实美味，大家都玩得很高兴；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们一起在清朗的满月下沿着城墙散步。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个年轻人一起沿着城墙散步，之后我们常常一块儿走走，有时是在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照在故宫的金瓦上，把整个紫禁城都染成了金色；有时是在周六，我们一同走在秋天凉爽的空气和明媚清澈的阳光里。³¹

在一次散步时，乔治向克拉拉求婚。她写道，在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学校吃晚饭，而是找了一家安静的中国餐厅来庆祝我们订婚的日子。我倒了两杯中国茶，我俩以茶代酒来祝福我们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³² 中国为他们的相爱提供了一个浪漫的大背景，将他们的感情与更大的中国使命联系在一起。中国也因这对浪漫的情侣而染上了爱情的氛围，反之亦然。如果不仔细看中国中部广大的贫困农村地区，中国山水同样令人着迷。在描述福州建宁（建瓯）的农村时，克拉拉这样写道：

29 同上, 17

30 Preserve from what, we do not know, but Edward Said critiqued similar misplaced yearnings by scholars of the Orient, who treasured a refined and ordered civilization of the past over the impoverished conditions and messy politics of the present, preferring the culture to the people. See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1978).

31 Shepard, *Bonds of Love*, 15

32 同上, 17

我们今天下午所看到的景色，会令那些探寻度假胜地的人们感到十分欣喜。树木繁茂的山脉与峡谷，散落在山间的小块稻田，奔腾的溪流和秀丽的竹林令人赏心悦目。但是如果初来乍到的旅行者将视线移到这里的小村庄和破败不堪的农舍，就会看到全然另一番景象。住在这里的男女老少又恐惧又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们知道，迷信与无知牢牢束缚着这些村民。仅从他们外表来看，甚至不用检查，就知道很多人患有疾病。他们的生活条件贫乏，在地主多余的土地上劳作。当时革命仍然离那些村民很远，而教会尚未开始帮助他们。³³

革命来了，但这不是基督教的革命。孙中山先生于 1911 年宣布革命后，各地的武装风起云涌，支持建立共和国。人们在热烈地讨论该由谁来统治新中国这个问题。在北伐战争（1925-1928）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联手，从军阀手中夺回对国家的控制。当联合部队快要抵达上海时，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反抗力量在上海取得了成功，令国民党和支持国民党的上海商界精英感到十分惊讶，从而制造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惨案。之后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对共产党进行清剿，估计共有 30 万人被杀害。围剿迫使共产党撤退到江西省山区，以争取时间重整力量。在发生这一切时，谢泼德夫妇在福州西北部的建宁（建瓯），离江西很近。战斗蔓延到了建瓯，有几次谢泼德夫妇不得不转移到较大的城市避难。最终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开始渗透到建瓯，装扮成“理发师、木匠、石匠、挑夫和小商人大谈国民党的人浮于事、互相排挤和冷漠无情”。³⁴谢泼德夫妇的学生被他们的言语说动了，开始离开村庄。而谢泼德夫妇对共产党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共产党，因为他们“亲俄、反西方、反宗教”³⁵；另一方面，他们尊重红军战士，因为他们“纪律严明，他们的行为与贪得无厌、玩忽职守的政府军形成鲜明对比。红军在夺取富有地主和商人财产时毫不手软，但在向老百姓买东西时从来不差一分一厘。”³⁶后来，乔治·谢泼德受蒋介石夫人的影响，帮助她实施新青年运动（New Youth Movement），这是

33 同上, 73

34 同上, 77

35 同上, 78

36 同上

针对共产党的倡议和改革而提出的基督教——国民党运动。克拉拉回忆录中的主要部分是
与乔治一起努力将中国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他们与中国的恋情则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语言障碍：海伦·莱诺拉·金特纳（1930至1934年）

海伦·莱诺拉·金特纳（1901年至1982年）出生于俄亥俄州佩恩斯维尔（Painesville），就读于海德堡奥伯林学院。她在辛辛那提大学学习护理，之后被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任命为传教护士，在河北省通县（今属北京市行政区通州）的通州医院工作。金特纳参加传教的动机并没有深刻的宗教根源。当她在当时的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总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实习时，她似乎对神学院的环境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一天早晨当她被要求领导大家祈祷时，她犹豫了：“我不愿意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觉得我无法带给大家精神上的启发。自大学时代以来，在精神方面我的确成长得很不够。”³⁷

在她西行的旅途中，她抑制了自己对遇到的年轻男子的强烈感受。她先坐火车去旧金山，然后乘坐日本轮船太阳莫鲁号前往中国，她表达了自己对几个年轻人的感情：

昨天晚餐时，一个小伙子坐在我对面，他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学生，整个暑假都在冰川公园做向导，假期结束要返回学校。他是一个健康的小伙子，跟他聊天很有趣。然后我走到最后一节观景车厢，看着远处银色的铁轨越变越小。随着夜幕渐渐降临，我们身后红色的灯光不停闪烁。我跟一个外表帅气、引人注目的巴拿马小伙子聊天，真应该跟他多聊聊，好进一步地了解他。³⁸

广阔的大海也吸引了她的注意。上船之后她写道：“晚饭后，我们三个走出船舱，去船头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一阵惬意的凉风迎面吹来，真有些凉，大家都得穿上外套。天未全黑，仍能看到夕阳的余晖，随后下了一会儿雨。但不久天又放晴了，星星在头顶闪烁，越来越多，越来越密。”³⁹另一次，她又返回到船头，并再次记录了她的感情。“今天早

37 Helen Kintner Eggleston, *Letters from China*, MPPC, Record Group 8, Box 357, Folder 13, p. 3

38 同上, 12

39 同上, 19

晨早起，我与威尔斯小姐一起又去了船头，我们看到了许多飞鱼！一些飞鱼周身银色，一些长着红色的翅膀。它们像飞机模型一样航行，然后又落回到水中。”⁴⁰

当海伦第一次登上太阳莫鲁号轮船，就收到一封来自传教会的信。这封信的风格非常亲切，类似于直接指向听者的感性传教风格，让听者相信他们是唯一的受众，牧师也最关心自己能否得到救赎。

“亲爱的海伦：我们写信谨祝你在启程前往传教地区的旅途上一帆风顺……我们一定要告诉你是：教会的所有人都对你非常关心，我们会继续关注你毕生的事业，分享你的成功，分担你的问题。有你的加入真是太好了！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这当然让我感到非常温暖！⁴¹

这封信中表现出的极具个人风格的语言恰恰是传教地区所缺乏的，因为外国传教士往往缺乏足够的语言技能。外国传教团意识到语言效率在感化和一般传教任务中的重要性，便要求传教士必须在到达中国之后立即去语言学校或请私人教师，接受密集的语言培训。例如谢泼德夫妇先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中文，去教区以后在私人教师的指导下继续语言学习。金特纳在私人教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中文，但她学得非常吃力：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除了口语和阅读之外，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写汉字？我有时迷迷糊糊，但有时又激动不已。今天早上，我一路走去学校，Hazel的一个小朋友认出我来，同我一起走。他试图与我聊几句，但我们的沟通不太顺畅。你可以想象，我的中文用起来还不够流利。⁴²

她饶有兴致地回忆，一次她问阿妈要一块“大石头”来抵门，结果说成了“大舌头”。随着她的会话能力逐渐提高，她能更成功地进行一些交流。一次她与一位士兵聊得不错。另一次，她在周末去农村短途旅行，借宿在一个寺院，与寺里的佛教僧人进行了交谈。由

40 同上, 19

41 同上, 18

42 同上, 61

于语言不够流利，她无法深入当地的社区生活，只有在外国人聚集的社区才能找到归属感。为了能与其他外国传教士见面，金特纳的许多空闲时间都花在来回北京的路上。家信也为她提供了维系情感纽带的机会，她常常能在信中向家人倾诉情感。金特纳有可能在语言上取得突破，并能用更好的语言进行情感交流。但由于她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太短了，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

金特纳文笔优美，时常绘声绘色地描写乡村诗意的景象。她记叙了一次在爬西山时看到山坡上的一个池塘：“池塘周围都是高高的老树，树冠一直伸向池塘，树上淡紫色的紫藤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到水面上。”⁴³她这样描写远处一条蜿蜒的河流：“河边三三两两地聚着妇女，有的在洗衣，有的将衣服展开晾在河岸上。”她还注意到遥远的山谷中有一群骆驼：“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望过去，仿佛是一群密密麻麻的蜜蜂。”⁴⁴在家信中，她只提到过很少的几次与当地人交往的经历。一次她提到了在她印制一批邀请函时，一位好心的印刷商在计算总价时给她打了折扣。另一次是坐火车遇到的邻座妇女，让她把沉重的旅行袋放在座位旁，并在下车时帮忙一起搬行李。如果金特纳在中国的时间再长一些并能掌握中文，她讲述的故事将会大不一样。她不仅能描绘诗情画意的风景，无疑还会描写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

亲密接触： 韦尔瓦·V·布朗（1932 年至1951 年）

韦尔瓦·V·布朗，在1932年至1951年间受美国浸礼会国外传教会（ABFMS）派遣在中国的汕头和福州服务。她记录了在当地教会工作的一位仆人不幸去世。她的故事让人思考是否可能逾越文化、阶级、职业和语言障碍，实现亲密的接触。

不久以后，另一位老仆人——在教会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船工得病死了。如果他有机会识字，他的一生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他有好长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但我认为他是死于伤心过度……他一直不肯吃东西，我设法喂了一些进去，不过也

⁴³ 同上, 93

⁴⁴ 同上

无济于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比平常更难受，照顾他的男孩打电话叫我。他的房间不超过七英尺宽。老人躺在板床上，床就是几块木板拼成的，下面支着一对木马，床上铺着一条席子。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尽我所能地安慰他，让他好受一些。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就像我在美国最特殊的教民床边，给他们带来最后的慰藉一样。⁴⁵

布朗用感伤的笔调描述了一种带有个人情感的亲密接触，这是很少见的，也对是否可能进行跨文化情感流动以及促进或抑制情感流动的条件提出了问题。语言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障碍，但是，由于情感发生在语言之前，语言本身并不一定会妨碍亲密接触和情感的流动。然而，即使语言不存在障碍，依然有其他阻碍情感流动的因素。宗教、阶级或职业的确影响能否将对方作为对象，甚至影响构造对象的方式。病人、家仆和异教徒都是医生、主人和基督教传教士建立关系的对象。每种情况下的情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体之间的情感流动的种类和程度。对于传教士，目标是先使对方皈依基督教，然后让对方接受基督徒的爱。医生为病人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但很少对病人的情感给予关注。由于仆人是工人，主人对他的生活不会给予关注，在上述情况下当仆人变成了医生的病人，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如果没有老船工生病这个改变他们之间关系的因素，布朗永远不会与老船工有这样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关系对为病人提供临终关怀的医生而言会变得更亲密。但这种交流也是有限的，没有更多的个人情绪的表达或交流。她不知道这个老船工是谁，我们更不得而知。

露丝·摩根在抵达中国后不久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展现了另一个例子，清晰地反映了阶级对主体之间情绪的塑造与限制。露丝早期的信件提到了许多关于造房子和布置房间的细节。在一封信中，她提到当地的中国人对她的尊重：“听到这些你可能会感到宽慰，我们随时待命，等一接到通知就能马上出发。我们体面地呆在这里，与中国人在一起，但如果任期结束，我们也不想再多做停留……与此同时，我们与一个勤快的女仆相处得很

45 Velva V. Brown, Letter to "Inger and the Old Gang," 9 August 1925. MPPC, Record Group 8, Box 31, Folder 3

好。”⁴⁶然而，罗兰在信末用铅笔写了一小段便笺，提到他们解雇了一个“消极怠工、偷鸡摸狗”⁴⁷的厨子。只要仆人把活儿干好，大家就能保持不错的关系。

尽管医疗传教士肩负着拯救生命和心灵的双重责任，显然前者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由于医疗需求似乎更大，而感化存在政治风险。宗教感化不一定是医疗干预的直接后果，反映了医疗传教模式的局限性。尽管伯驾治好了不少病人，由于他未能感化多少异教徒而被传教会辞退。20 世纪初，传教会意识到，医疗和文书的工作都是全职工作，无法由一个人来同时完成。⁴⁸因此拆分了医疗和文书的工作，由两名专业人员并肩工作，传教场所也被相应地分为教堂和医院两个区域。此外，八国联军的入侵暴露了传教场所的脆弱和潜在的敌对反传教活动的威胁，无疑让传教会医疗方面的作用给予更大关注。

情感丰富的夫妇：爱丽丝与刘易斯（1925 年-1932 年）

尼尔·亨廷顿·刘易斯（1895-1980）于 1895 年 8 月 30 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他就读于奥伯林学院，在那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爱丽丝·阿尔伯特·熙（1900-2001）。大学毕业后，尼尔考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 Western Reserve（现为 Case Western）医学院。毕业后他被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派往在福州的美国教会医院与金尼尔博士一同工作。爱丽丝与尼尔于 1925 年 5 月 28 日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结婚。

尼尔·刘易斯代表在中国工作的新一代医生，来中国是出于工作而非宗教原因。虽然他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并就读于一所知名传教士辈出的大学，但他不认同对于传教的热切召唤。一封家书反映了他有些叛逆的态度：“我读了《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上面的几篇文章，但只对它“没原则”的态度印象深刻，这种伪善的神圣无法说服我。”⁴⁹ 他受传教会委任，但还没有被授予圣职。尼尔的父亲对儿子走上传教道路起到

46 Ruth Morgan, Letter to home, 26 February 1905, LRBMP 126-2-18

47 同上

48 See Lorenzo Morgan's letter home, "I think that Blanche once asked about the evangelical work that we doctors on the Mission field had to do. For us there is little time for that sort of work and it is left entirely to the preaches of the Mission." (29 April 1906, LRBMP, 126-3-48)

49 Neil Lewis, Letter to mother, 16 December 1925, MPPC 8-361-1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四处托人帮儿子寻找教职。尼尔的父亲于 1898 年在中国设立了首家基督教青年会（YMCA），并带着全家人来到中国。尼尔在上海居住了 7 年，一直呆到 12 岁。因此到中国传教对他而言就像回家一样。所以尼尔对待他的传教工作不是出于感召，而是出于重温儿时冒险的激情。在前往中国的船上，他就给母亲写信：“亲爱的妈妈，现在我们的目光都转向一个新的世界，期待着去进行伟大的冒险，我们都迫不及待了。”⁵⁰ 轮船途径日本，在另一封从日本寄出的信中，他写道：“能这样活一次才算是没有白活。”⁵¹

尼尔·刘易斯曾在福州和福州附近的 Ingtau（永泰）工作，刘易斯夫妇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点了一连串的鞭炮来迎接他们。爱丽丝在写给婆婆的信中比较了福州和永泰：“我们都非常喜欢永泰。这里的人们生活贫困，无依无靠。但他们都非常友好，这是难能可贵的。在这里，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友谊。这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在城市里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对我们心存疑虑。”⁵²

尼尔外出工作时写给妻子的信唤起了深切的爱恋，这在恋人的情书里是很常见的，但在传教士中并不多见。他的信反映了他的另一层感情，这可能是仅仅局限于夫妻之间的一种感情。他在信中亲昵地唤妻子的小名“吉米”。由于尼尔的工作需要他去偏远的农村，有时要呆上几个星期。他外出时，妻子爱丽丝深深地思念着他，写给他许多充满激情的信。在一封回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吉米，你是从哪儿学会说“我的心满满的都是对你的爱”这样的话？坏家伙！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吗？你这个讨厌鬼，为什么读你的信还让我心惊肉跳？我的心脏会受不了的。先是收到厨子的信，昨天是莱杰（Leger）家

50 Neil Lewis, Letter to his mother, 7 October 1925, MPPC 8-361-1

51 Neil Lewis, Letter to his father, 15 October 1925, MPPC 8-361-1

52 Alice Lewis, Letter to mother-in-law, 13 December 1925, MPPC 8-361-1

的信，一直到了昨天晚上，你的信终于到了。你到底要做什么呢，是想和我亲热吗？
我真受不了！就说这些吧。⁵³

在中国工作的医疗传教士中，尼尔算不上典型的热衷传教的一类，他不过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并接受了基督教教育，但这也影响了他与在教区遇到的中国人的关系。大部分是由于基督教建立了情感和机制，推动传教士到偏远地区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而忘我地工作。然而，同样的情感结构也可能限制跨文化交流。对于尼尔而言，他写了一系列的人物速写来描述最吸引他的一系列主体，以及这些主体反映出基督教的美德，在他看来包括无私而坚忍不拔的精神。其中一个故事描写了一个得了关节结核病而住院的女孩。她给原本死气沉沉的环境带来了生气，但不幸的是女孩的病情突然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刘易斯认为她的天性具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精神”。但为何不能是“儒家”或“中国人”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年轻人纯真的精神？

她是一个神采奕奕且富有耐心的女孩，在我们去看她时总是带着开朗的笑容，愉快地回答我们每日的例行问题：“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她的精神影响了整个医院尤其是儿童病房。房间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她帮助每一个新来的孩子熟悉陌生的环境。我们的女传教士每天花几个小时，给她读书，讲圣经故事，并教她识字，她俩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小杜梅（Little I-Muoi）会给其他更小的孩子读书，教会为孩子们开设的了几个小时的识字课，她总是热心地来帮忙，一直呆到下课。

突然她的病情急转直下，病得很重。少了她的笑容，整个屋子的人都感到难过。在一个晚上，她静静地走了。虽然她从来没有受洗，但我相信她已经到了天堂，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因为有她的榜样而活得更好，因为她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精神。⁵⁴

53 Neil Lewis, Letter to Alice, 9 September 1927, MPPC 8-361-1

54 Neil Lewis, “I-Muoi”, MPPC 8-361-5

这个故事记录了一个发现和认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进行真正的、无中介的感情交流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影响小杜梅，干预她天真无邪的精神，使她成为一个基督徒，认识到爱是一种跨越文化、跨越东西方、植根于全人类心灵深处、先于认知、超越一切隔阂的力量，更有助于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可以这么说，刘易斯被小女孩的精神深深感动，并写了这个故事来纪念她，赞美她独特的天赋。

结论

在本文中，我展现了医疗传教士在回应传教感召、前往传教地区途中和在传教地区工作时所表达的感情。基于这些情感，我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在华工作的医疗传教士情感的论文。我也注意到传教士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的主题，而不同传教士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教会在传教士对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中国的情感方面产生的影响。另一个主题是出身小城镇、殷实的中产阶级的医疗传教士了解他们的特权，也拥有追求职业生涯的手段。这个时期基督教构建的情感结构，让传教士来到地球的另一端，来到文化迥异的地方为穷人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时代的传教士之间，这种结构开始变化。伯驾、慕赓扬和尼尔·刘易斯传教的动机各不相同。伯驾将自己视为 19 世纪新教世界福音运动的一部分，而刘易斯是为了追求冒险的感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成为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的一个障碍。此外，对于医疗传教士，由于他们服务的对象是贫困多病的中国人，传教士可能会同情他们，但不会完全平等地对待他们。因此，阶级、职业和文化，都会阻碍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情感流动。然而，历史上能用一种了不起的方式打破这种壁垒，并重建新的情感结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影响着美国医疗传教士和当地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最终能在档案馆发现珍贵的文献，找到一个真正的对话时刻，反映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直接接触。在这种对话中，双方都能接受对方，并能摒弃成见；那时与爱有关的对话会成为现实，为交流创造新的可能。

（高蓓译 吴朝霞校）